

55度的白酒喝过,55度的绍兴黄酒第一次见识到。眼门前有几个酒坛,贴了红纸酒标:28度、40度,最有杀伤力的是55度。黄酒酒精度通常是在14度以下,怎么会有这么高酒精度的黄酒?在绍兴安昌古镇沿河旧屋的楼上,我们发出了同样的疑问。

55度的绍兴黄酒

马尚龙

很想喝一口55度的黄酒,到底是什么味道,但是主人提上桌的是28度的。当天下午我们要坐高铁,主人是为我们酒后安全着想。早知道有高度黄酒,我们一定推推让让。虽不懂酒,也想尝尝像高度白酒一样的黄酒。

又像是没听懂,但是主人一口绍兴话,分明是在为高度绍兴黄酒贴“信得过”证书。

我拍了几张酒坛照片发在朋友圈,马上有朋友应答。有像我这样好奇地问,更有懂酒者的疑问:高度酒是蒸馏而为,蒸馏就不是黄酒,可能是糟烧白酒。我不懂酒,无法解释,只记得主人说是“特殊工艺”制作。怎么个特殊,我不甚了了。

有位朋友顺便说,这家酒馆旁边有一家酱园极其有名。仁昌酱园,不是拍电影的,是卖酱油的老字号,还有上百酱缸在太阳下散发酱油酿造的气味。我去店堂逛了逛,学着绍兴话问问价,店里伙计还以为我是绍兴人。我对地方语言很有兴趣,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想学一句两句。而且,在我执拗的臆念里,只有听到了古镇的市井俗语,这个古镇才是古的。

江浙一带多古镇,安昌很是普通,至今还只是4A级,但是我很有好感。从河边细窄的商铺中穿过,听到的皆是绍兴话的吆喝。有两三个当地女

人,一面做着生意,一面讲讲各自的家事。“碧水贯街千万居,彩虹跨河十七桥”之安昌美誉,就散落在被她们一截截剪下来的“扯白糖”里。主人介绍说,这里做生意的都是安昌本地人。

这些年,常常去古镇。一河二街、二河四街,老旧的木屋,沿着青石板路走过去。大多是南腔北调的各地方言,炸着同一块臭豆腐。缺少了当地的市井俗语,臭豆腐和古镇就少了情感的关联。55度的绍兴黄酒,如果是一个操着异地方言的大汉或者小女子在介绍,这黄酒纯度一定是打折扣的。我弄不懂55度黄酒到底是如何制作出来的,但是我相信它的黄酒属性。

大凡古镇,总是在地理风貌、人文历史和世俗特产上,有自己的个性化古意,才得以保护下来,闻名天下。近些年,随着旅游业的流行潮流,古镇的个性化标签,纷纷满足于网红打卡。走在古镇,满目是红灯笼和黄旗。许多学者说,古镇古代时,并非如此张扬。我请教过古镇的朋友,朋友说,如今和“古”有点牵连的旅游景区,必是以红灯笼来证明自己的古装身份。不挂红灯笼,游客就不把你当古镇了。

我想到了枫桥。看到过一张100年前的枫桥日照,说实话,有旧日乡气,却看不出张继诗中的古意。能够完美体现枫桥夜泊意境的,是已故画家颜文樑上世纪60年代的作品《枫桥》,画面上每个细节,都可以对应《枫桥夜泊》。几年前我去了枫桥。晚上经过,不去夜泊,“夜过”应该也不错。凭着张

契诃夫的小说名篇《小公务员之死》中,一个喷嚏的后果被主人公无限夸大,最后竟然导致其一命呜呼。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,在批判对人对构成重压的权力结构的同时,也以准确独到的细节和丰富细腻的内心理白,精确地为一种病态人格画像。正如心理学家阿德勒《自卑与超越》中所述: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,一个人感觉自己无能为力,就会产生自卑的情绪。自卑情绪有很多种表现形式,比如眼泪、愤怒、歉意。小公务员如此执着地反复道歉,根源正是其极度的自卑。

自卑可能来源于身处底层的无力感,也可能仅仅来自某种生理缺陷——这里预设了一个隐性前提与潜在标准,即健康体面的人,应是没有明显残疾、与大众没有明显不同的正常人。生理或心理上与众不同、格格不入之人,都会被归入“畸人”一类,遭遇嘲讽、排挤甚至更残酷的伤害。

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《竹林中》描述了一桩凶案,借不同人物的供词,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多变与真相的不可抵达。黑泽明的电影《罗生门》据此改编,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。这位小说家出道即巅峰,其写于24岁时的短篇小说《鼻子》得到文学大家夏目漱石的极力赞赏和推崇:“那样的作品再写上二十篇,他会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。”这篇除了我们熟悉的文洁若的译本之外,还有一

外、夜半钟声……我常常是个想多了的人。我个人更喜欢多一些原始元素的古镇。吱吱嘎嘎的木楼梯走上去,俯身看得到沿河细街的

嬉戏,听得到古镇人讲古镇话。55度绍兴黄酒没有品味过,还想再去,而且一定要去弄弄清楚,此高酒精度黄酒,是怎么制作出来的。

个鲁迅先生的译本。不知道小说中的病态心理和深刻讽喻,是否也影响过鲁迅的创作。

《鼻子》的主人公是一位侍奉主佛的僧侣,在寺庙中有一定的地位,有徒弟侍奉,也经常讲经传道。但这位老僧有一只长长的鼻子,人们对此指指点点,议论纷纷,他自己更是为此苦恼不堪。他的世界,绝非

喷嚏与鼻子

周春梅

佛门清静之境,似乎有一只大象,伸出一只长长的鼻子,不断搅动,遮蔽住了一切。小说描述他为逃出长鼻子世界所作的种种努力:他一心想着如何让这鼻子比实际上显得短一些,没人在时,他就从不同的角度照镜子,专心致志地揣摩。他还不断地留心察看别人的鼻子,不厌其烦地端详进出寺庙的人们的脸,既看不见深蓝色绸衣,也看不见白单衫,更看不见僧侣们橙黄色的帽子和暗褐色僧袍。其实他也不看脸,单看脸上的鼻子,但魔镜鼻子是有的,像他这号鼻子,却连一只也找不到。最后,他竟然想在佛教经典里寻出一个鼻子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,好排遣一下心头的愁闷。这番书本里的探寻,也以失望而告终。

与《小公务员之死》不同,《鼻子》出现了一个荒诞的转折,老僧的徒弟进京办事,跟一位远方的僧人学到了一个缩短鼻子的妙招:“办法极其简单,仅仅是先用热水烫烫鼻子,然后再让人用脚在鼻子上面

踩。”这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,有意思的是,正如杨绛在《干校六记》中所说:“希望的事,迟早会实现,但实现的希望,总是变了味的。”老僧的鼻子终于变短了,但是人们的议论嘲笑非但没有停止,反而变本加厉。当时年仅24岁的小说家在此处加上了一段超越年龄对于人性的深刻认知:“人们的心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。当然,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的。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之后,这方面却又不知怎地觉得若有这方面,说得夸大一些,甚至想让那个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。”并将之概括为“旁观者的利己主义”。

《祝福》中的祥林嫂屡遭不幸,人们一开始对她心存同情,后来同情渐渐,仅剩看戏般的赏鉴、无情的嘲弄与欺凌,这其中也包含了同处底层的柳妈和其他“老女人”。试想一下,如果祥林嫂的命运得到根本性的改善——当然其可能性小之又小——我们也不难想象人们的怅然若失,甚至妒忌与仇恨。

《鼻子》仍然以荒诞的情节来收尾:一天早晨,“寺院里的银杏和七叶树一夜之间掉光了叶子,庭园明亮得犹如铺满了黄金”。明亮的秋景,预示着奇迹的发生,老僧的鼻子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他在黎明的秋风中晃荡着长鼻子,喃喃自语道:“这样一来,谁没有再笑我了。”

小说就此结束。老僧天真的想法是否会实现,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。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,人们或明或暗的嘲笑议论,会因此戛然而止吗?



下山不言峰顶景 (篆刻) 陆康

满庭芳·石榴花
宿雨初晴,榴花似火,照眼霞光缤纷。细枝柔叶,满地落红。忽见青圆果色,吟秀句、道是春痕。南窗下,晚香频绕,月下动诗魂。

五月花语

徐子芬

微醺。当此地,胭脂碎剪,胜景为邻。指嘉树凭栏,心念长存。兴会欣逢诞日,芳辰度,谁拜长裾?轻攀折、嫣然巧笑,着意在妆新。
画堂春·月季花
花开花落四时同,枯荣不计东风。傲寒战暑自然红。其乐融融。
郊野园林随处,水声山色相从。无尘脱俗锦云空,别样芳容。

我的曾外祖父叫曹雪松,小时候,听表姐说,他是曹雪芹的亲弟弟,她说得很认真,所以,我深信不疑。表姐还说,他很有钱,每次回来都会带一只皮箱,里面全是钱,只要有人叫他一声“曹先生”,他就给一张钱。这可把我高兴坏了,我说:“如果他哪天回来,我就叫个不停,这样,很快就发大财了。”

可惜,我一直没机会见到他,晚年的时候,他居住在上海,准确地说,是虹口公园附近的一条小巷里。我总是喜欢把这些巷子叫做上海的旧袜子。晚年的曾外祖父,一定很孤独,但他却从来没有回过故乡,这一点,令人费解。他去世那一年,我六岁。我记得那天一大早,父亲和母亲就出门了,母亲给我做了几块韭菜饼和稀薄的糯米粥。天气很好,暖融融的阳光打在脸上,让人特别想睡觉。我坐在硬木椅子上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,已是黄昏。屋子里还是我一个人,门被反锁了。屋子外面,温暖而安详。

天快断暗时,父亲和母亲从外婆家回来了。他们站在门口的菜园前说了一会话,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干什么,也不知道他们站了多久。我在一张红漆的桌子上玩自己的游戏:用钢笔、梳子、镜子、吸管、老虎钳作为角色,演一台舞台剧。吃饭的时候,我才知道曾外祖父去世了。

之后的一段时间,家里并没有什么变化,母亲还是去服装厂上班,带来布料的气味。父亲还是在地里干活,带回一小袋马铃薯或者几个茭白。过了大概一个月,舅舅运来了一些旧家具——两张红漆的凳子,一张茶几,一张矮板凳,都

曾外祖父曹雪松

盛慧

是曾外祖父用过的。后来,外婆还送给我一本《圣经》,纸张发黄,像一片片发霉的饼干,上面有曾外祖父的字迹。
我的曾外祖母比他早三十年去世。那是一个彻骨的冬夜,她挎着包,准备到上海去。那时候,乡下在闹饥荒,曾外祖母已经很久没吃到大米了,平时吃的是红花团子。所谓红花团子,就是将红花搓成团,在面粉上滚一道,扔进煮沸的水里。她就是在那个冬夜,落进村口的池塘淹死的。

外婆家有自己的娘家,相隔一片桑园。六月中旬,枝条上挂满紫色的桑葚,那是我们的乐园,我们在桑园里一吃就是一个下午。穿过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,便是外婆的娘家,可她很少回去,因为,那里已经没有亲人了。

外婆曾去上海“帮人家”,那时,



曾外祖父曹雪松

母亲还没断奶。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,一天早上,吃早餐的时候,她煎了几条小鱼下粥,婆婆很生气,觉得她太败家,她一气之下跑去了上海,母亲开始吃别人的奶,后来没奶可吃,饿得面黄肌瘦,外公去上海把她追了回来。
2002年五月的一天,天气闷热,汗水濡湿了衬衣,我身上黏乎乎的好像泥鳅一样。我在网上输入了曾外祖父的名字,竟意外找到了很多关于他的资料。原来,他曾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编剧,系列电影王先生当时在上海家喻户晓,他不仅当编剧,还扮演剧中的主要人物“小陈”。我接着搜索,发现他还与洗星海合作了《搬夫曲》,与沙梅合作了《船娘曲》,他创作的《雪茵情书》被称为世间最美情书。他曾将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改成剧本,徐志摩为上海大东书局主编《新文学丛书》收录了他的作品《心的惨泣》,刘大白、郑振铎曾为他的诗集《爱的花园》写序……1950年,经友人孔另境介绍进了虹口中学,担任历史老师。

那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奇妙时刻,我兴奋极了,像考古工作者取得了重大发现。虽然我从没见过曾外祖父,但他一直在我的身体里,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液,我的心跳里有他的心跳。我坚信,我走上文学的道路,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。

继的诗句,枫桥旅游很热。夜里远远看去,比上海外白渡桥还耀眼。人声嘈杂,霓虹炫目。游客皆是因名诗而去,不过到了枫桥,要紧的是拍照,都快活地沉浸在月落乌啼“灯满天”,江枫渔火“无处眠”的错位情景中。照片里的枫桥是不夜桥,有悖张继的诗意,但是如若照片中夜色混沌枫桥模糊,当不合乎游客的心意。我则突发奇想,如果在夜里某个完整,枫桥所有的华彩灯火熄灭两三分钟,夜空传来《枫桥夜泊》的诗句,让游客置身于旧时姑苏城

在“一带一路”国际贸易的宏大画卷中,跨国合同是合作的桥梁,而纠纷则像暗礁潜藏,随时可能阻碍企业前行。我作为汇业国际仲裁团队负责人,带领团队处理的这起由国际商会(ICC)国际仲裁院管理的仲裁案,不仅是一场捍卫国有资产的重磅,更是中国律师在国际舞台上的专业实力展示。

当某国营能源龙头企业找到我们,委托处理总争议金额超1500万欧元的国际贸易尾款纠纷时,案件的难度让人倍感压力。仲裁地和开庭地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,程序和实体适用瑞典法,仲裁语言是英语,而被申请人是中东能源领域根基深厚的老牌企业。长达十年的合同纠纷,上百份证据材料,还涉及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(CISG),以及瑞典、阿联酋等四个司法辖区的管辖和法律适用冲突问题。看着客户信任的眼神,我明白,这不仅是法律上的较量,更是守护国有资产的责任。

团队迅速进入状态,我负责整体把控,团队成员分工协作,与客户各部门高效沟通,有条不紊地收集、梳理证据。面对海量材料,我们像拼图一样,仔细研究每一个交易细节,反复推敲合同条款、交易时间、沟通记录。

研究过程中,案件复杂性不断显现。幸好,依托“MTCC徐汇协议”搭建的国际网络,我们快速联系到瑞典、阿联酋、中国香港的合作律所,及时解决境外法律问题咨询。这些支持,让我们在复杂的法律迷宫中找到了辩论的方向。

开庭当天,我和团队另一位合伙人代表客户出庭。考虑到案件重要性,客户企业年近六旬的首席运营官带着翻译机,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旁听了三天庭审。走进ICC仲裁庭时,我能感觉到心跳加速。现场气氛严肃,对方律师和公司代表眼神里透着轻视,这反而激发了

我们的斗志。当对方律师对我方核心证据提出管辖权异议,现场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但我们早有准备,凭借扎实的法律理论和案例,用流利英语逐条反驳。陈述时,我清晰阐述每个法律依据和事实逻辑,看到仲裁员频频点头,我知道,那些日夜奋战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历时一年,经过四轮书面意见交换,每一份文书我们都反复打磨,力求逻辑严谨、论据有力;三天高强度庭审,我们与对方激烈交锋,时刻保持专注,抓住对方每一个破绽。

最终,当仲裁庭驳回对方所有程序性请求,实体裁决基本支持我方立场的裁决书到手时,办公室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。92%的胜诉率背后,是无数个修改文书的深夜,是数不清的头脑风暴,是整个团队的智慧结晶。客户授予我的“荣誉员工”称号,其实是对整个团队的认可。

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,“MTCC徐汇协议”不仅是资源网络,更是中国律师在国际舞台的底气。作为少有的全程由中国律师主导的涉外仲裁胜诉案例,它不仅为客户挽回巨额损失,更证明中国法律人有能力在国际上捍卫权益。

如今,汇业律师事务所持续推进国际化布局,已与美国、法国、瑞士等多国律所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,为跨境业务提供高效协作服务。同时,律所涉外团队多次亮相国际青年律师协会(AIJA)年会、国际商标协会(INTA)年会等国际会议,分享实践经验,把握国际法律前沿动态,通过专业成果展示和深度交流,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。

20余年的涉外法律执业,我见证了中国经济浪潮中的奋进历程。

责编:刘芳

客户授予我「荣誉员工」称号

陈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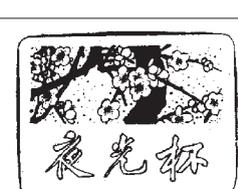
陈成

陈成

陈成

陈成

陈成



夜光杯

十日谈

法治护航“一带一路”